

论元初诗人刘因的诗歌创作成就

黄琳

作为封建正统文化之精英的诗歌,在经历了唐宋的鼎盛发展,呈现出异常令人瞩目的成熟繁荣局面后,从元代开始,似乎就走向了不可挽救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元曲,而元诗,则被摒弃在“唐诗宋词元曲”之外,很少得到古今学术界的瞩目。诚然,元诗欲与前代诗苑争胜,确乎很难,然而它“上接唐宋之渊源,而下启有明之文物”(顾嗣立《元诗选凡例》),独特的时代特色,以及诗人特殊的创作心态和风格特征(参拙文《元初诗人刘因的文化心态》《河北师院学报》91.3),却也有着唐宋诗不可替代的价值。

刘因,即是元初在北方诗坛上脱颖而出,以其创作实绩打破了平庸局面的诗人。对元诗的不够重视,自然也造成了对刘因研究的匮乏,加之资料不足,目前仅台湾有学者专文论述,所憾也不能见到。窃以为对刘因的研究,除填补一些空白外,还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元好问以后诗歌在元初的发展趋向及当时特殊政治经济条件下文人们的创作心态。本文拟就刘因的诗歌创作成就作一初步探索。

刘因(1249—1293),一名颙,字梦吉,雄州容城人(今属河北),元初著名的学者和诗人,在元初声名很大。曾多次受到荐举和征召,一度出山,旋即辞归乡里,从事教学。他在理学和诗歌创作方面都有一定成就,尤其是他的诗歌,改变了元初诗坛的沉寂局面,颇受时人推重,对元诗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刘因遗著,今存《四部丛刊》影印元宋文堂刊本《静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影印《四库全书》抄写至正刊本《静修集》,其中包括《丁亥集》五卷、《樵庵词集》一卷、《遗文》六卷、《拾遗》七卷、《静修续集》二卷,合为三十一卷,收入诗歌近千首。刘因一生很少浪迹于南地北,除一度到过大都外,仅在镇州、易州过住。其余时间家居教授,基本上在太行山麓。他的诗,除少部分写太行风物外,大多数写隐居生活,以及一部分题画、咏史、怀古之作,表现了他的个性特色。

前人曾称刘因是金末元初诗坛上继元好问后的第二大诗人,就刘因诗歌的艺术成就和风格特色看来,此说实非过誉之词。刘因生活于元初,蒙古王朝灭金以后,与南宋两相对峙达四十多年之久,当时的北方诗坛主要受金代诗风的影响。王恽《西崖赵君文集序》言:“逮壬辰北渡,斯文命脉,不绝如线,赖元、李、杜、曹、麻、刘诸公为之主张,学者知所适从。”袁桷《乐侍郎诗集序》中也说:“金之亡,一时儒元犹秉旧闻于感慨穷困之际,不改其度,出语若一。故中统至元间皆昔时之绪余。”说明了元初诗坛,自元好问到刘因的承继关系。由于诗歌在唐已达到顶峰,发展到宋后,更注

意技巧和形式,欲加以突破创新。以文为诗,以理为诗,雕词琢句,使诗歌逐渐生涩乃至僵化,出现了许多弊病。在金末诗坛上,已经有许多人想变革这种现象:“金自南渡后,诗学为盛,其格律精严,词语清壮,度越前宋,直以唐人为指归。”(王恽《西崖赵君文集序》)王恽这段论述虽然不能涵盖诗坛所有的现象,但也较真实地道出了金末诗坛的复古趋向。其中,尤以元好问崇尚豪迈清壮,崇尚自然与美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予诗坛以深刻的影响。刘因在文艺理论上,除了形神关系外(《书东坡传神后记》),没有明确提出什么主张,但从他在易州写给学生的临别赠言所说:“魏晋而降,诗学日盛,曹、刘、陶、谢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诗学日变,变而得正,李、杜、韩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诗学日弱,弱而后强,欧、苏、黄其至者也。”(《叙学》)看法和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基本相近,显然元好问的理论主张给了他极大的影响,其诗歌的流派师承,由此也可大抵见之。

刘因诗歌,直溯汉魏盛唐,且颇得其中精髓,诗风豪宕、苍劲,又兼有沉郁。

刘因少年时颇有用世之志,加之阅历不深,故早期诗作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豪放的风格,这与他当时的思想胸怀不无关系。他的古体诗,受李白、韩愈、李贺的影响较多,自言“斯文元李徒,我当拜其旁。”对时人称赞自己有“呼我刘昌谷,许我参翱翔”(《呈保定诸公》)之句,颇感自豪。“昌谷”即指李贺。可见他于李贺诗艺已达到了有所造诣的程度。刘因自编《丁亥集》时,“悔其少作”,删去了《呈保定诸公》一诗,但并非针对其创作艺术。他中年以后所写七言,仍不免有李贺气味。其杂言《观雷溪》:

飞狐天下脊,老气盘五回。三江泻天怒,合为一水东南来。此势不杀令人愁,石门喜见西山开。未补青天裂,谁凿混沌胎?奇声猛壮万古奇,山根几许犹崔嵬。两山倒倾澜,百丈逢颠崖,先声动毛发,馐爽开襟怀。初疑万壑转奔石,意像仿佛坤轴摧。又疑鼓角鸣地中,百步未到仍徘徊。……穿石谁能穷窟宅,流沫势欲浮蓬莱。平生芥蒂今寒灰,两耳到骨几纤埃。酈元笔头天下水,石门之奇犹见推。乃知兹游亦奇绝,快弄素电喷琼瑰。东崖一片石,坐抚千年苔。为招郎山君,共挈长鲸杯。江妃为挝灵鼓催,赤鲤跃出银山堆。先生醉来泉洒面,狂歌一和湍声哀。

写他游太行山飞狐岭观看雷溪瀑布,从气势、形态、声音各个方面,极其夸张想象之笔,抒写雷溪瀑布的奇壮,更融神话传说于其中,表现了他游赏时的豪情逸兴,语言和感情都有纵横开阔之势,抑扬跌宕之韵。另一首《西山》:

西山龙蟠几万里,力尽西风吹不起。夜来赤足踏苍鳞,一著神鞭上箕尾。天风冷冷清入肌,醉抱明月人间归。嫦娥洒泪不敢语,银河鼓浪沾人衣。寄谢君平莫饶舌,袖中此物无人知。

此诗想西山(太行山)之大,从而梦游上天,“醉抱明月”以归。其中“赤足踏苍鳞”“天风冷冷”“银河鼓浪”与《观雷溪》中的“素电喷琼瑰”“江妃挝灵鼓”“赤鱼军跃出银山堆”等,皆是险怪瑰丽的意境,这正是李贺诗歌的最大特色。两首诗中都尽情驰骋想象,熔铸词采,李贺之长,已运用自如。当然,刘因年轻时学李贺,并非就因此将他的诗单一地划归某家某派。正如以上两首诗,以及《咏荆轲》、《呈保定诸公》等,或从魏晋学来,意气又俨然如李贺;而豪情气势,奇想夸张,又兼有太白遗风;或奇崛险怪,师承韩愈。他是兼采众长融变为自己独特风格的。

真正能代表刘因诗歌特色的,是其七言、歌行。元初诗歌多承袭模仿,而刘因以其苍劲高迈,在诗坛独树一帜。这种风格,《登镇州龙兴寺阁》最能代表。刘因生长在太行山麓,有较长时间生活在镇州,这首诗即是他登临太行山龙兴寺阁时所写:

太行鳞甲摇晴空,层楼一夕蟠白虹。天光物色惊改观,少微今在青云中。初疑平地立梯磴,清风西北天门通。又疑三山浮海至,载我欲去扶桑东。雯华宝树忽当眼,拍肩爱此金仙翁。金仙一梦一千载,腾掷变化天无功。万象绕口恣喷吐,坐令四海皆盲聋。千池万沼尽明月,长天一碧无遗踪。我生玄感非象识,此眼此

臂将安庸。海岳神光理禹鼎,人间诡志何由穷。金天月窟尔乡国,玉毫万丈须弥峰。一杯讵欲呼与语,为我返驾随西风。堂堂全赵思一豁,江山落落吾心胸。中原左界此重镇,形势仿佛余兵冲。歌舞遗台土花碧,旗帜西风霜叶红。乾坤割裂万万古,乌鸢蝼蚁谁为雄! 溥水悠悠自东注,落日渺渺明孤鸿。

隆兴寺在今河北正定县城内,创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大悲阁是其主阁,十分庄严壮观,尤其是其中的千手千眼观音像,气宇非凡。刘因登上阁顶,纵览正定古城的风光,突发奇情逸兴。首二句,由苏轼“千山动鳞甲,万谷醒笙钟”化来,写天光山色,万物奇观,声势极壮,飘然若高蹈绝尘。此后极其铺张扬厉,于想象中如临仙界佛境,有东海三神山浮海而至,势欲带诗人东去扶桑;而千手千眼观音的壮观,又幻化出佛界的无边法力。诗人神思渺渺,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十分神奇壮丽,融现实与幻化为一体的艺术境界。最后,在对无边佛法的惊羨与对西天极境的向往中触发了对尘世的感叹。山川形胜、沧桑世态,包容了诗人的无限思绪:“中原左界此重镇,形势仿佛余兵冲。……乾坤割裂万万古,乌鸢蝼蚁为谁雄?”乌鸢蝼蚁,典出庄子故事。诗人在此借喻,写中原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被各种势力争夺割据,从未安宁,而天地乾坤,依旧浩然宽广。表现了诗人阅尽世间沧桑、高迈旷远的人生气度。此诗属七言歌行,全诗押宽阔洪亮的东冬韵,音调铿锵,气势奔放。由阁外至阁内,由仙境入人世,笔势纵横,收合有度,十分整饬。胡应麟《诗薮》称:“刘梦吉……歌行学杜,《隆兴寺》、《明远堂》等作,老笔纵横,虽间涉宋人,然不露儒生脚色。元七言苍劲,仅此一家。”实乃的评。刘因这种苍劲豪宕,又时发伧语的风格,在他其它的诗作中还有很多表现,如《五月二十三日登城楼》、《金太子允恭唐人马》等。在《乙亥十月往平定奔外舅郭判官丧,早发土门,宿故关,书所见》的七古中,写太行山局部的山形、山势、景物,怪怪奇奇,最后发出感慨:“北门形胜护中原,辨与奸雄增技痒。太行横绝半九州,留在平原几尘埃。何人为我起六丁,嵯峨尽堕天宇朗。”也是说太行山这个中原的北门屏障总被奸雄利用,他居然想铲掉太行山,这就和杜甫《剑门》诗末的“君将罪真宰,意欲铲叠障”同样气度了。

刘因诗歌,在触及咏史、抒怀及个人身世上,又体现出挹郁梗概而又内蕴奇气的风格。对于宋金之亡,刘因一直不能释怀,而对历史兴衰和现世政事的洞察,又让他将深邃的目光投向了亘古沧桑。这方面,以他的咏史诗最为典型。刘因有一首著名的七律《白沟》:

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

白沟在刘因生长的容城附近,乃宋辽交战的国境线。刘因借赵简子以宝符暗示其子进攻代北的典故,比喻宋朝皇帝多不能继承宋太祖谋取幽燕的遗志。一贯的妥协投降,不仅使宋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时机,而且金人攻宋,又将宋金边界推到江淮之间。刘因一针见血地指出,宋的颓势,不仅仅是宋徽宗的过失,宋太宗、宋真宗和赵普、王钦若之流也难辞其咎。追源祸始,刘因把宋朝灭亡,汉族政权不振的远因,又追溯到晚唐五代。他在《渡白沟》中进一步写道:

莱公洒落近雄才,显德千年亦英主。谋臣使臣强解事,枉着渠头污吾鼓。十年铁砚自庸奴,五载儿皇安足数。当时一失榆关路,便觉燕云非吾土。更从晚唐望沙陀,自此横流穿一缕。谁知江北杜鹃来,正见江东青鸟去。渔阳挝鼓鸣地中,鸱鸪飞满梁园树……

全诗从白沟何以成为国界立论,盛赞了寇准之类勇臣和显德皇帝这样的英主,而对桑维翰之流的“谋臣使臣”卖国求和十分义愤。自李克用勾结契丹,宋政权便逐步崩溃,有如黄河决口始于一线。刘因感怀至深故而作诗寄托遥深:

天津月明啼杜鹃,梁园春色凝寒烟。伤心莫说靖康前,吴山又到繁华年。繁华几时春已换,千秋万代合欢扇。铜雀香销见墨痕,秋去秋来几恩怨。一声白雁更西风,冠盖散为烟雾空。百钱袷锦天留在,祸胎要鉴

骊山宫。当时梦里金银阙，百杯楼前无六月。琼枝秀发后庭春，珠帘晴卷天门雪。棹歌一曲白云秋，不觉金人泪暗流。乾坤几度青城月，扇影无情也解愁。五云回首燕山北，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花漫漫冰峨峨，大风起兮奈尔何！

全诗以宋理宗所题两把官扇为题，借咏物写时事，写尽了宋朝的兴衰变迁，意象凝重，用典隐微，比兴遥深，情感抑扬。如前述两首诗，具有极强的概括力，寄托了兴亡之叹，哀悼之情，但刘因南悲临安北怅蔡州，并不囿于就事论事，而是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神与物游，思接千载，以深邃敏锐的目光洞察历史，昭示亡国垂鉴。刘因这种超越史事的独特眼光，还表现在他的一系列诗作中：他从汉朝政权的衰败来写《明妃曲》，表现出一种民族感情，并以《大风歌》来鼓励汉元帝重振“汉家气象”，不同于历史窠臼；《和咏荆轲》则否定燕太子丹的刺秦活动，而要求九国仁政强国、同仇敌忾等等；而在《白马篇》中，又借南宋施全刺杀秦桧之事影射王著等刺杀作恶多端的元中书左丞相阿合马的壮举。纵观古今，细阅世事，刘因才发出了对宋金相继灭亡的激愤叹惋：“试听阴山敕勒歌，朔风悲壮动山河。南楼烟月无多景，缓步微吟奈尔何”（《题理宗南楼风月图》）“物理兴衰不可常，每从气韵见文章。谁知万古中天月，只辨南楼一夜凉。”（《同上》）“已未天王自出师，眼前兴废想当时。临江酌酒男儿事，谁向深宫正赋诗。”（《题理宗书卷》）皆痛言宋君不恤国事，自取夷灭。对“白首归来会同馆、儒官争看宋师臣”被俘不屈的家铉翁等宋臣表示敬意，而斥责留梦炎之徒“风节南朝苦不伸，汴流直欲到昆仑。世宗一死千年见，此是黄河最上津。”对五代时寡廉鲜耻，历事四朝十君，丧尽节操的冯道，更欲“何当铲叠障，一洗他山羞”。（《冯瀛王吟诗台》）要为民族洗去羞辱。

在刘因的不少登临怀古诗中，他的悲怀激烈表现得更明显、更强烈，深有魏晋慷慨劲健之风，和杜甫的沉郁顿挫之气，尤其是一些五七、言近体：“朝游樊子馆，晚上武阳城。潮接沧溟近，山从碣石生。断虹云淡白，返照雨疏明。且莫悲吟发，樵歌已怆情。”（《登武阳》）“古戍寒云接渺茫，故乡游子动悲凉。江山自古有佳客，烟雨为谁留太行。野色分将愁外绿，物华呈出夜来霜。海门何处秋声急，极目沧波空夕阳。”（《登雄州城楼》）刻划的都是一幅苍茫悲壮、辽远的意境和梗慨的胸怀。其《书堂旅夜》，也颇似杜甫《北征》、《梁甫吟》等抒怀诗深沉、忧愤的风格：

淹留已半载，去住意何深。月色一千里，愁人方寸心。秋声助摇落，生理叹浮沉。松桂清霜满，哀歌动故林。

是乃刘因亦身经乱离，阅尽沧桑，故不独得杜诗之精神，且胸中有泪，亦言之有物。

二

刘因诗作，有相当一部分归隐之作。

如前文所述，刘因在元初曾多次受到荐举和征召，曾一度出山至大都，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年（1283）被任以承德郎、右赞善大夫，旋即为国子祭酒。但刘因初涉官场，便发现并无实现平生愿望之可能，便以母疾辞归。戚然之心情，在《夜坐有怀寄故人》等诗作中皆有流露：“高情千古谢安石，壮志平生马少游。有错真成六州铁，欲还空说大刀头”。淡淡说来，其悔更深。待终于摆脱了勾心斗角的环境，便决意不出了。以至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再次征为集贤学士，嘉议大夫时，几番坚辞不就，连世祖也叹息道：“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元史·刘因传》）加之文化的涵浸、理学的深习、对世代更迭的领会，刘因痛切于汉家文化的衰落，遂从理学寻求根基，立定了“静以修身”的思想行为准则，（详参《刘因文化心态》一文）隐入山林，过起了田园生活。刘因与绝

大多数封建文人不同,对于仕与隐,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君子立心之初”,应当“为善而不为恶”,“为君子而不为小人”,“苟为善也,为君子也,则其初心遂也。”或“出”或“处”,只要是“为善为君子”,不论“义当闲适”或“时在匡济”,都已“遂其初心”(《遂初亭记》),足见其出与处,决非终南捷径之类庸俗心理。故其隐居,除研习学问、家居教授之外,或闲游赏景,或静坐饮酒赋诗,悠闲自在。相应的,这一时期的作品也反映了这种恬淡的生活,尤其是一些山光水色林景,写得雅致清新,透出山野意趣,田园风貌,引人入胜,很有特色。

如《玉溪精庐》:“居然山四顾,危槛俯晴春。川气生不极,翠润流布衣。林荫起薄暮,酒色生微醺。歌声忽落谷,惊飞欲归云”。短短八句,将晴日黄昏的山野秀色和悠悠行云、落谷歌声以及诗人酒兴微酣的情态表现得格外动人。再如《野亭会饮》一首:“行乐人生当及辰,今朝光景为谁新。林阴薄薄微露日,花气溶溶暖着人。春色十分看欲尽,鸟声千种听难真。东风就手吹残酒,无限青山动翠鳞”。花缀青山,鸟鸣东风,诗人秀林亭饮,一派洒脱自在的图景。这些诗恬淡清新,虽较之陶渊明的隐居田园诗来,仍在朴素清新,自然成趣方面略逊一筹,技巧的痕迹也略可见出,还没有达到天然浑成的程度,但在总体风格上已近陶诗。

刘因晚年学陶,《和陶集》便是他学陶之作,咏怀之集。和陶始于苏轼,金末赵秉文也曾和陶。但刘因的和陶一卷写于辞官之后,与陶潜行止相近,故借和陶来抒写自己归隐后的胸怀,与赵秉文身为礼部尚书,闲玩文学的情况不同。对陶潜,他不仅推尊其诗旨,更推尊其品行,他们的遭遇虽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相通,即他们都有济世之心、高洁之性,又皆因生不逢时而退隐。由此,便不难理解其诗歌与陶诗有不解之缘的底奥了。刘因和陶直抒胸臆,不假雕琢,无论语言、意境、思想、风格皆与陶诗逼近。

刘因年少时,是未曾想到过人世沧桑的。他在《和归园居》中说:“少小不解事,谈笑论居山,”仅是一种戏语而已。等到现实生活使他真正走向隐居生活时,他才真正体味到陶潜那种闲适生活之外对清贫盛世的向往和对现实的不满。近代文学大师鲁迅说陶潜并非一味飘逸,刘因也早就这样理解陶潜了。他曾有“每读渊明诗,最爱桃源长”之句,向往桃源,否定暴秦。结合他“人生丧乱世,无君欲谁仕”以及“忽忆少年日,猛志隘九州”之句,表明刘因也和陶潜一样,不满现实。毕竟“叹老自非缘白发,爱闲元不为青山。”(《秋望》)他并非一身静穆,退隐也是无可奈何而为之。他把元朝的统治隐隐比作暴秦,虽然他和陶潜一样无力反抗,但也和陶潜一样“猛志固常在”,这从《和咏荆轲》诗中,明显看得出来。他写道:

两儿戏邯郸,六国朝秦嬴。秦王鸢鸟姿,得饱肯顾卿。燕丹一何浅,结客报咸京。当时势已危,奇谋不及行。政使无此举,宁免系颈纆。如丹不足论,世岂无豪英。天方事扫除,孰御狂飚声。我欲论成败,交歌呼贾生。乾坤有大义,迅若雷霆惊。堂堂九国师,谁定讨罪名。一战固未晚,何为割庭庭;区区六孺王,山东但空城。孟荀岂无术,乘时失经营。今虽圣者作,不求乱已成。酒酣发羽奏,乱我怀古情。

陶潜的原作,肯定燕太子丹的刺秦活动,而惋惜荆轲的剑术不精,没有成功,基本思想出于司马迁的《刺客列传》。刘因反对搞暗杀,赞成贾谊的《过秦论》,认为九国之兵敌不过秦国,一是他们不讲正义,“师出无名”;二是无抵抗决心,常常割地求和;三是不采孟荀施行仁政以调动人民“同仇敌忾”的积极性。结合刘因《书事》中“朱张遗学有经伦,不是清谈误国人”的诗句来看,刘因是在惋惜南宋之亡,其不满元朝统治的隐衷,也就可见了。所以,陶潜不是一味“飘逸”而常怀“猛志”,刘因也同样是暗藏“猛志”的。表现在诗中,伤时之意累见。《和归田园居》:“人生丧乱世,无君欲谁仕。沧海一横流,飘荡岂由己。”《和拟古》:“忍饥待竹实,淡荡今何之,歌以灵凤谣,乱以猛虎诗。”《书

堂旅夜》：“丈室不自扫，寸心徒尔豪，世徒仍险阻，风物固萧骚。”时政如此悖乱，刘因又是“冷然石上足，不逐随波流。长风索我御，欲举仍迟留。”（《游源泉》）所以才说“西山霍原宅，古迹犹可稽。长吟豆田谣，愁云落崩崖”。想通过隐居、退匿行迹来最终保持明德，所谓“伤时仍磊磊，对景即休休”。虽在许多桃源诗中，仍表现了对桃源的无限向往，也终以汉时曾入汉廷而不仕的商山“四皓”、曾朝宋太宗亦不仕的陈抟（希夷）自况，做了个人外人，世外身。故诗作虽个别深沉凝重而透露出梗概叹惋之气，但和陶一类，仍不失为其高远的人格理想与和谐意境的统一，表现出从容优雅明快格调，于恬然中，又显豪放，旷远。

陶潜诗信手拈来，如不经意。刘因的这类诗，也是信手拈来，毫无雕琢之气，于平淡朴实中显示胸怀。如《和咏贫士》：

陶翁本强族，田园犹可依。我唯一亩宅，贮此明月辉。翁复隐于酒，世外冥鸿飞。我性如延年，与众不同归。孤危正自念，谁复虑寒饥。努力岁云暮，勿取贤者悲。

陶潜乃陶侃之后，本来就是“强族”，陶潜辞官以后，不仅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而且还有田可耕。刘因只有一亩之宅，只能种点菜蔬，他感到自己的性格有些像颜延年。陶潜曾以“独正者危，至方者碍”规劝颜延年。刘因觉得自己也有“孤危”之感，哪还考虑“寒饥”呢？表明他生活不及陶潜，但也安贫乐道，不求人也不怨天。他还在《和饮酒》诗中写道：

十年小学师，一屋荒城隅。饥寒吾自可，畜养无一途。亦愧县吏劳，催征费驰驱。平生御穷气，沮丧恐无馀。长歌以自振，贫贱固易居。

他靠教授村童维持生活，不御饥寒，又不足以“养”继母和“畜”妻子，连催征的县吏，对自己也无可奈何。诚如嵇康所说“贫贱固易居，贵盛难为工。”安于贫贱，于刘因心志，又有何不可呢。

刘因安于贫贱，不肯求人，又不肯做官，其实正是珍重自己的品德。他在《和拟古》中写道：

依依月光缺，**荧魄**恒独完。清光如素丝，长怀缀君冠。形虽隔万里，咫尺皆君颜。望君君不来，十年不开关。岂无黄金缿，藉以青锦端。爱惜明月珠，肯为黄雀弹！庭前秋柏实，月夜栖孤鸾。君尝寸心苦，中有千岁寒。

这是一首“感遇”式作品，表明自己辞官不做，隐居授徒，是为了坚持松柏岁寒的操守，不以明珠弹雀。寄托遥深，令人神往。

刘因在《和陶集》中，也缅怀往哲，或批评，或景仰，以寄托自己的志趣。如《和杂诗》写道：

太玄岂无知，不觉世运迫。为问莽大夫，何如成都陌。扶摇得真《易》，太卧山云白。中有安乐窝，气吐宇宙窄。消长灿似密，彼主我为客。问子居何方，囊中有真宅。

扬雄仿《周易》著过《太玄经》，也曾在成都向严君平学过《易》理，但他后来失足，臣事王莽而被称为“莽大夫”，就不如在成都巷陌隐居为好。说明他根本不懂《易》理。真正懂点《易》理的，例是自号“扶摇子”的陈抟，看穿了“消长”的气运，就隐居深山白云之中，不肯做官了。刘因是景仰陈抟而鄙视扬雄的。他还在另一首《和杂诗》中写道：

朝耕隆中田，暮采成都桑。平生淡泊志，丑女同糟糠。爱此真丈夫，忘我厨无粮。当年“静修”铭，团茅鸡距阳。回头十五载，尘迹徒自伤。山居久岑寂，主静岂无方。安得无极翁，酌我上池觞。

刘因曾居鸡距泉之阳，取诸葛亮“静以修身”的意思，名所居为“静修庵”，他对诸葛亮“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遗言，深有体会。辞官之后，他希望进一步真正达到“主静”的境界。当然，刘因并没有忘情现实。他在《和饮酒》中写道：

四时有代谢，寒暑皆常经。二气有交感，美恶皆天成。天既使之然，人力难变更。区区扶阳心，伐鼓达天庭。乾坤固未坏，杞人已哀鸣。虽知无所济，安敢遂忘情。

作者深于《易》《老》之学,懂得一点朴素的辩证法。他知道阴阳消长为天理之常,不可改变。天下有治有乱,也无可奈何。正如他在另一首《和饮酒》中说的“既知治常少,莫叹才虚生,”不必过分悲伤。但是,“人力”虽然难于“变更”这个乱世,而作为汉族知识分子,他不能坐视民族文化的消亡,“虽知无所济,安敢遂忘情”,他依然从教授生徒中积极传播并保存民族文化。

刘因早年学李白、韩愈、李贺等,咸宗汉魏,形成了豪迈、苍劲且梗概沉郁的风格。晚年尚陶,又形成了冲淡、自然、不假雕琢的风格,《和陶集》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远非赵秉文之流所能企及。

三

如前所说,刘因的七古及杂言诗,从李贺入手而兼学韩李;刘因的五古,学陶潜直抒胸臆,冲淡自然而内蕴奇气。至于刘因的近体诗,也是兼学唐宋而不着意求工。他本即是元代名儒,又是著名理学家,故其近体诗在某些方面似受理学影响。试以《西湖》为例:

水窦深藏十亩烟,卖书真欲买渔船。数椽破屋已自足,四海虚名良可怜。醉后不知清露下,兴来拟共白鸥眠。濂溪漫有当年志,老去而今只爱莲。

这个西湖当然不是杭州西湖,而是他家乡附近的西湖,湖面大概不过十多亩。他对着西湖,忽然想到自己空有“可怜”的“四海虚名”,不如卖书买船,做个渔翁。因为“老去而今只爱莲”。周敦颐(濂溪)写过《爱莲说》,说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刘因认为自己辞官不做,正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体现。与他的另一首《白莲》诗“安得同爱人,同此良夜永”同一旨趣。而颈联的“数椽破屋已自足,四海虚名良可怜”,第五字平仄互易,成为拗句。这在刘因其它七律中甚多。例如《五月二十三日登城楼》的“云移山影乱初定,雨带风声来渐豪”;《次韵答范阳生》的“曲肱睡起亦何事,弄月归来徒自吟”;《过徐桥》的“十年往事不回顾,百里清泉如可闻”。不能说刘因有意学杜甫和黄庭坚,他是信手拈来,自成拗句,并非为拗而拗。此外,受理学影响,有些诗也涉及理趣。如《李伯时〈马〉》:

足不能行气自驰,天机深处几人知?世间无物能形此,除我南窗兀坐时。

此诗题画,画中之马,“足不能行”,但“气”在奔驰,他觉得这种境界很难说清,只有自己“南窗兀坐”,心驰万里之外和万古之上,才能与此相似。又如《题可庵》

莫道无衣不可身,更从裘葛辨冬春。恶恶(wu)不可恶恶可,戮称无星恐误人。

自名“可庵”的人,大概取义于“无可无不可”,意思是不问是非。刘因反对这种提法。他认为,不能说什么衣服都“可”穿,因为冬只能着裘,夏只能衣葛,哪“不可”哪又“可”呢?像戮秤上没有星点,就会误事。说理很明白。又如《下山》:

峻岭重岗尽意登,要收风景入高明。下山却向山头望,始觉从前险处行。

上山时兴致很高,一味往上爬,下山之后再回头望去,才感到自己多么冒险啊!这也许是他辞官之后的感受吧!又如《雨晴》:

雨晴物物自生春,喜气浮空似有纹。吾亦乾坤物中一,相看草树自欣欣。

这是充满理趣的心理描写,与程颢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极为相似。

宋人喜发议论,刘因诗亦往往如此。如《子期听琴图》:

琴瑟自吾事,何求人赏音。绝弦真俗论,不是古人心。

伯牙断琴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比喻世间知音的人很少。刘因的翻案,是从理学来发议论的。又如

《读史》一诗：

纪录纷纷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

史论家所谓“诛心”之说，相沿已久，刘因一反其说，认为从字里行间追求古人的“心术”，未免冤枉好人，与今人重效果不重动机之论，极为相似。

刘因还写有一些反映家庭生活的小诗，也颇异于常人情调，如《书李渤联德高蹈图》组诗。本来画梁鸿、孟光夫妇隐居故事，刘因却借题发挥，写自己家庭的生活情趣和心态。这组诗有十多首，影元刊本《静修先生文集》只录五首，而《四库全书》本《静修集》还多出几首。其中之一云：

虞序吹罢补麻衣，习取禁寒抗老饥。幸自伯鸾无识者，对人不必案齐眉。

封建文人都喜欢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希望妻子也象孟光尊敬梁鸿（伯鸾）一样尊敬自己。刘因却反对这种礼教俗套，颇有异于古人的生活情趣。其中之一又云：

牙牙女巽似偏刚，教女如羊尚恐狼。若使此刚能有用，文姬却不辱中郎。

传统的说法是“生女如羊。尚恐其狼”，认为女子秉性应该象羊一样柔顺，时时防她出现刚强性格。刘因发现自己女儿（巽似为其乳名）性格似偏于刚，他却一反传统，说女儿刚一点好，如果蔡文姬性格刚强，就不会受辱于匈奴了。当元之世，女子刚强还是比柔弱好些。观点虽然仍属于传统的封建道德，但从爱护女儿一点看，仍然富有人情味。

刘因的一些小诗，更是信手拈来，似乎不假思索而饶有情趣：

来时残雪点征衣，落尽庭花尚未归。梦里不知身是客，青衫归路马如飞。 —《万寿宫馆舍》

马蹄踏水乱明霞，醉袖吟风受落花。怪见溪童出门望，鹊声先我到山家。 —《山家》

梦回闻雨声，忽觉是风叶。问余何以知，仰见梁间月。 —《偶成》

邻翁走相报，隔窗呼我起：“数日不见山，今朝翠如洗” —《村居杂诗》

均是涉笔成趣，每见妙语，自然而然地充满了生活情趣。很多景物写来，也是别具情态，奇特新颖。如写禾苗：“禾稼乍迎红日影，依稀学似杏花残”。写群蜂：“酒醒梦觉日将午，蜂学远山风雨来。”写角声：“人间无物比悠扬，谁道一声随夜长。馀哀到晓无寻处，吹作南湖十里霜。”写初春：“道边残雪护颓墙，墙外柔丝露浅黄。春色虽微已堪惜，轻寒休近柳梢傍”。而对前人曾写尽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凉这大小车儿”也载不动的愁，也写得别有一番滋味：“谁教篷溜如愁思，欲断还连到天明。”语意十分传神生动。

刘因淡于功名，作诗有时近于陶潜，又用理学家的心情来看待生活，使读者感到闲情和理趣，但无论是哪一时期的创作，其“不平”之气仍然在压抑中不时露出。诚如他在《读史》一诗中说的：“人间多少不平声”，这“不平”不仅是个人的，更是民族的，如他的《感事》诗：

高天厚地古今同，共在人形视息中。四海堂堂皆汉土，谁知流泪在金铜。

用金铜仙人流泪典故来感叹汉族政权的灭亡。“不平”之气跃然纸上。又如著名的《观梅有感》诗：

东风吹落战尘沙，梦想西湖处士家。只恐江南春意减，此心元不为梅花。

西湖处士指北宋诗人林逋。林逋在西湖的孤山种了许多梅花，刘因观梅而想起林逋，想起了伯颜进兵临安（杭州），战争的烟尘破坏了“江南春意”，这难道不是有感于民族文化受到摧残而产生的“不平”之气么？此诗诗意曲折含蓄、寄托遥深，堪谓“尺幅万里”。深切地表现了诗人心怀。类似此意的《琼花图》亦有“春风不相待，回首已焦土”之句，叹息元宋战争破坏了扬州琼花，同样流露了民族文化受到摧残的“不平”之气。哽噎于心而发于诗，这已成为刘因心中绵绵不绝的心理情绪。思之读之，常常有回肠荡气之感。